

体能素养的社会建构逻辑：阶层差异下的运动认知、实践与资源获取路径比较

赖 冉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20

【摘 要】：体能素养的形塑本质是社会建构的过程。本研究基于布迪厄资本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框架，揭示阶层分化下体能素养的生成逻辑：运动认知层面，精英阶层持“身体投资”观，中间阶层陷功利化焦虑，底层群体受限于生存理性；运动实践层面，精英通过高门槛项目（如私教）固化圈层，中产依赖商业服务进行符号化碎片实践，底层群体被挤压至有限公共空间；资源获取层面，制度性资源（如学校体育）存在“精英挤占”，市场化资源受经济资本筛选，社会网络资源加剧阶层优势。三者互构形成“认知-实践-资源”闭环，导致体能素养的阶层化再生产。破解路径在于：推行运动补贴券等差异化补偿政策，强化公共资源的普惠可达性，并将公平评估纳入体育教育体系，为“健康中国 2030”目标下促进体育公平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体能素养；社会建构；阶层差异；运动认知；体育资源；体育公平

DOI:10.12417/3041-0630.26.12.030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健康中国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构建全民健康生态体系，体能素养作为个体参与体育活动的基础能力，已成为实现该目标的战略性支点。《“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刚性要求，而 2023 年新修订《体育法》进一步将“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法律框架。然而政策推进面临深层结构性矛盾：国家体育总局《2022 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城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差距达 12.3 个百分点，高收入群体体育消费支出是低收入群体的 6.8 倍，折射出体能素养发展的阶层化断裂。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多拘泥于生理机能测量（如最大摄氧量、肌肉力量）或运动技能标准化评估，将体能素养简化为可量化的生物性指标，忽视其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嵌入性。这种个体主义范式难以解释为何在相同政策环境下，不同阶层群体的体能素养发展呈现系统性差异，亟需从社会结构视角解构其建构逻辑。

1.2 核心概念界定

点，将其拓展为“在特定社会场域中，个体通过身体实践形成的动机-能力-知识-理解的动态整合体”，强调其作为文化资本与身体资本的复合属性。社会建构逻辑在此指涉体能素养并非先天禀赋，而是经由阶层化的文化编码（如精英家庭的运动品味驯化）、制度安排（如学校体育资源分配）、资本博弈（如商业健身准入门槛）共同形塑的实践产物。基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框架，阶层差异被操作化为三维度：经济资本（家庭收入、体育消费能力）、文化资本（父母教育程度、运动知识储备）、社会资本（体育组织参与度、教练资源可及性）。三者构成分析体能素养阶层分化的核心坐标系，突破传统以职业

或收入划分阶层的简化论局限。

1.3 研究目标与价值

本研究旨在解构体能素养形成的社会机制，通过比较不同阶层在运动认知建构（如身体意象的阶层化解读）、实践模式选择（如运动项目的符号区隔功能）、资源获取路径（如政策红利的阶层捕获现象）的差异化轨迹，揭示“资本-场域-惯习”互动下的再生产逻辑。其理论价值在于：第一，将体育社会学中的不平等研究从“资源分配”层面推进至“意义生产”层面，阐明体能素养如何成为阶层认同的具身化载体；第二，弥合健康促进研究与批判社会学的理论鸿沟，为理解健康不平等提供身体化视角。实践价值则体现为：精准识别政策失灵节点（如普惠性健身设施遭遇的精英挤占），提出资本补偿型干预策略（如基于文化资本缺口的运动指导师下沉机制），服务于《“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破解全民健身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的治理目标。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命题

社会建构主义揭示体能素养的本质是主体间协商的意义产物。伯格与卢克曼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指出，身体能力认知并非生物决定论的延伸，而是通过语言符号、制度规范、日常互动被持续重构的“集体知识库存”。体育实践在此框架下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个体具身化（embodiment）的过程，即阶层化的运动品味（如高尔夫礼仪、广场舞节奏）通过反复操演内化为身体习性；另一方面是文化展演的载体，运动场域中的身体技术（如瑜伽的柔韧美、健身的力量感）成为传递阶层身份的文化符号。这突破了传统体育学将体能视为“生理机

能总和”的认知，为解构其阶层分化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2.2 阶层理论的关键维度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剖析体能素养的阶层差异提供了操作化工具：

经济资本的制约性显见于物质壁垒：高装备成本、场馆会员费（高端健身房年费超低收入群体半年收入）直接区隔参与可能，呼应《2022 年全民健身发展报告》中“价格因素在运动中断原因中占比达 34.7%”的结论。

文化资本通过一种隐形方式作用于人们的运动认知结构，在上层社会阶层里，马术、击剑等所谓“高雅运动”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并且是一种以“身体是社会符号”为特征的价值取向，在下层社会阶层中由于缺少系统的健康教育（比如对于“劳动代替锻炼”的错误认知）因此形成了一种功利主义的身体观念，《家庭体育指导手册》颁布后所面临的困难也说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资本使得国家层面的政策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并且限制其发展。

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造成获得机会的不公平，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尤为突出。中产阶层利用业委会等方式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改善所在社区内的公共体育设施；而低收入者由于缺少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为孩子报名上学或者参加志愿服务等方面面临较大障碍。虽然《体育法》鼓励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但是由于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社会资本差异而难以实现。

2.3 分析框架构建：三维互动模型

结合综合分析，本论文构建体能素养社会建构的三维互动模型（如图 1 所示）：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组成部分，运动认知（观念层面）是人们对于体育活动所具有的阶层化的认识 and 解释。上层阶级把运动看成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的一种手段，普通民众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中产阶级由于担心工作而对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于理想的身材和状态有不同的要求并且成为一种标识自己身份的标志。这种认知形式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个体行为角度来看，运动实践受到经济资本以及历史惯性所支配，在具体表现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在项目的选择上体现出一种阶层化的趋势，比如马拉松赛事因为稀缺性而被中产阶级视作一种社交资本；其次运动频次受到经济条件限制，私人教练课程等高消费项目对于保持身体健康起到决定性作用；再次是工作性质对于个人运动习惯具有深远影响，在蓝领工人当中由于工作时间较为固定，很难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而根据《全民健身计划》提出的总体要求，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应当达到每人 2.6 平方米，但是这个数字并没有考虑到地区之间巨大差别，在一些高端小区中远超过这个数值，在一些农村或者落后地区可能连 0.8 平方米都不到。

资源获取途径是进行结构性考察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资本拥有量和社会资本所处环境限制双重作用结果。它有三种类型：制度性资源分配（如学校体育教师职称评定制度）；市场化服务提供方式（根据 Zipf 规律布局的商业健身房分布情况）；社会网络中资源流动特点（比如运动俱乐部中由少数人控制大多数资源）。虽然 2023 年国家发改委出台《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导则》以期改善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由资本决定筛选标准现状。

这一理论框架认为阶层身份对资源分配起到决定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资本配置对于社会结构中三个重要方面及其相互影响的作用。而这三个方面又通过认知与实践之间的循环往复、稀缺资源的竞争分配和社会关系网络化等途径形成一个封闭循环的阶层固化过程。这超出了以往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的研究范式，揭示出阻碍政策有效实施的主要原因是难以打破资本与其他领域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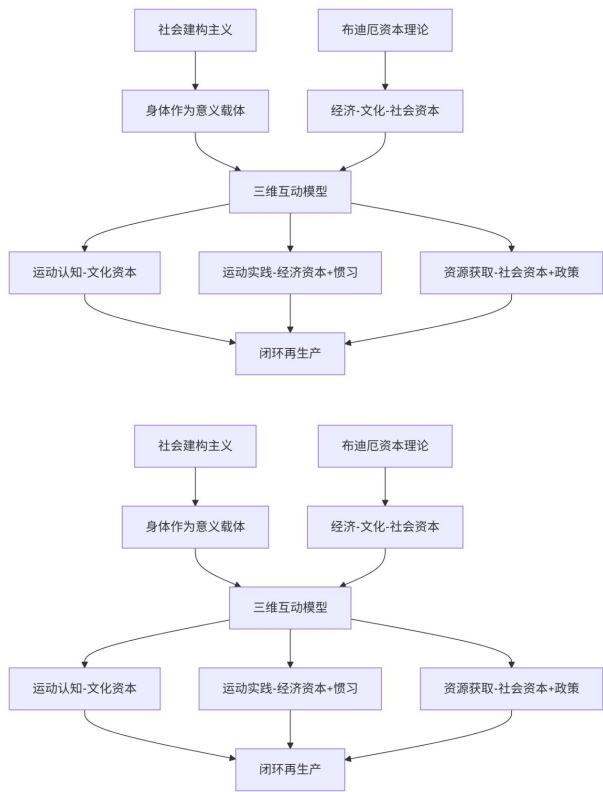


图 1 体能素养社会建构的三维互动模型

3 阶层分化下的运动认知建构逻辑比较

3.1 精英阶层：专业化与投资逻辑主导

精英人士对于体育的认知具有明显的专业化以及市场化

特点,在他们眼里,体育锻炼是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有效方式,也是体现身份地位一种象征。比如马术、高尔夫球和击剑等贵族运动已经不止是简单的健身方式,而是变成区分不同等级社会阶层标志物。它们一般都需要较大资金支持、专业知识培养以及一定场合下才可以进行,所以就和其他人群形成一道鸿沟。比如说,加入一个马术俱乐部或者高尔夫球场都需要一定条件,这不仅是对一个人财富水平证明,也是让他进入另外一个圈子捷径,在这些运动中找到自己归属感并且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种思维方式是建立在精英人士拥有多量的文化资本以及国际化的视野之上。凭借丰富的信息来源,他们很容易获得有关科学健身的知识并且明白体育锻炼对于增强身体素质、改善心情以及提高智力有好处并且将其作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由于生活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这些人的观念受到来自国外优秀体育文化的启发而让运动成为自身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而产生“运动体现社会地位”的想法。在“健康中国2030”的指导下,这些人响应国家的号召,找私人教练制定自己的计划使用各种高科技手段来监控自身的健康状况以此来不断学习运动的相关知识并提高自己对运动的实际掌握程度。

基于经济及文化资本双重优势,精英群体在体育认知上占统治地位,建立并普及“健康即为自律/成功”的理念。以新媒体形式展示标准化健身方式,在公域中讨论体育活动对于职业生生涯的意义,使个人体育锻炼成为符合社会期望的价值符号。而这一论述方式强化他们的阶级文化权力的同时也使用隐喻的方式把体育参与程度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独立以及将来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而加剧体育认知中的阶级固化现象。

3.2 中间阶层:功利化与焦虑并存

中间阶层群体对运动的认知具有明显的功能主义色彩以及实用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他们把体育作为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来使用,在教育上,“体教融合”使得学生的运动成绩与高考息息相关,于是有些家庭更愿意让孩子学习有衡量标准的运动项目(比如围棋、羽毛球或者游泳)而不是关注体育本身的文化意义以及可能带来的益处;在工作场所,运动也成为一种提高自身社会形象和地位的方式,去健身房健身或是参加马拉松等都是一代表生活方式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行为,在工作越来越繁忙的情况下,他们利用运动来舒缓身体疲劳,也慢慢形成了“运动就是一种保健方式”的观念。

这种认知模式是受到中间阶层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特点以及他们对于阶层跃升的心理预期的影响而形成的。虽然他们通过接受教育获得一定文化资本,具有了解体育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也掌握一定的相关技术,但由于工作上的竞争、经济负担、家庭等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参加体育锻炼,出现

“有知识但是不行动”的情况。随着社会流动性的降低,中间阶层为避免自己落入底层而积极寻找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来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体育就变成了一种可以用来稳定自身地位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由于缺乏内在的动力支撑所以这些人把运动当成一种责任而不是自愿的选择这就更进一步拉大了理论和实践的距离。

“知易行难”的健身困境是中间阶层运动认知的典型矛盾体现。他们普遍认同运动的重要性,甚至制定详细的运动计划,但实际执行中常因加班、家庭事务等原因中断。健身房年卡使用率低下、运动APP下载后闲置等现象,正是这种矛盾的具象化表现。这种困境本质上反映了中间阶层在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时间资本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他们拥有理解运动价值的文化资本,却缺乏将认知转化为持续实践的经济与时间资源,最终形成运动认知的功利化与实践的碎片化并存的状态。

3.3 底层阶层:生存理性与边缘化认知

底层阶层的运动认知呈现出强烈的生存理性特征,将运动简化为休闲娱乐的附属品或体力劳动的替代形式,健康认知则表现出明显的被动化倾向。在他们的认知体系中,运动并非独立的生活需求,而是劳作间隙的放松方式,如街头篮球、广场舞等低成本活动,其核心功能是缓解体力疲劳而非系统性的健康管理。对于健康的理解,底层群体普遍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将健康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疾病发生后的医疗干预,而非通过运动进行主动预防。这种认知使得运动在其生活优先级中处于边缘位置,仅在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才可能被考虑。

这种认知的形成源于文化资本匮乏与经济压力的双重约束。一方面,底层群体受教育水平限制,缺乏甄别科学健康信息的能力,容易被伪健康知识误导,难以建立对运动价值的系统性认知。健康传播的“知识鸿沟”现象在此表现明显——主流媒体的科学健身宣传往往采用精英化的话语体系,难以被底层群体理解接纳。另一方面,经济压力迫使底层群体将时间优先投入到获取生存资料的劳动中,运动作为“非生产性”活动被严重挤压。在 hourly wage 较低的情况下,牺牲劳动时间进行运动意味着直接的收入损失,这种经济理性使得运动成为一种“奢侈消费”,超出了其生存规划的范畴。

底层阶层的运动认知还面临着主流话语的符号暴力,被污名化为“懒惰/不自律”的群体。精英阶层主导的“健康=自律”叙事,将底层群体的运动缺失解读为个人品质缺陷,却忽视了其面临的结构性约束。这种污名化通过媒体报道、公共话语等渠道不断强化,如将肥胖问题归因于“不运动”,而非饮食结构、工作环境等客观因素。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不但消除运动资源分配中等级差别,而且把社会矛盾转化为个人道德问题,从而弱化贫困人群对于体育活动理解能力和使他们处于因为缺少资源而受到负面评价恶性循环之中,在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

略背景下,这种看法限制低收入者参与热情,加重公共服务领域内阶层固化程度。

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不但消除运动资源分配中等级差别,而且把社会矛盾转化为个人道德问题,从而弱化贫困人群对于体育活动理解能力和使他们处于因为缺少资源而受到负面评价恶性循环之中,在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背景下,这种看法限制低收入者参与热情,加重公共服务领域内阶层固化程度。

4 阶层分化下的运动实践模式比较

4.1 精英阶层:制度化与圈层化实践

精英阶层在体育方面表现出现代化、分层的特点。他们主要是依靠有组织的资源分配方式以及大量资金支持来实现这一目的,在实践中他们是更愿意投入大量金钱参与体育活动的人群,比如雇佣高水平教练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套训练计划或者加入高端体育俱乐部享受各种待遇等,这不仅是他们对自己身体健康负责的表现,也是他们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像马术这样的运动,一年所需要花费的资金就高达几万元甚至更多,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承受。此外他们的训练也有严格的规定性,会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制定全年训练计划并不断进行调整;有些家庭还会把体育当作一种文化的传承,在孩子身上培养他们对某种运动的兴趣爱好如高尔夫球或者击剑等。而跨文化的体育消费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去国外体验滑雪或者是夏令营等活动既是一种国际化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获得世界范围内优秀资源的方式。

作为社会精英阶层进行体育活动的重要载体,空间资源为其提供了优越条件。而他们凭借专门体育场地进行高质量体育活动,例如私人会所内恒温泳池、高端会员制体育俱乐部中的健身器材等。一般情况下这类地方都有严格的限制条件来保证其成员构成稳定性和 exclusivity,并提供个性化服务使成员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而在教育方面也有许多优质私立学校拥有丰富体育资源,它们内部设有标准马场或帆船训练基地等一流体育设施。并且这些学校体育课程都紧密融合一些高端体育赛事,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竞争力及发展潜力。这也是一种经济资本转化为体育资源方式,同时也加剧不同阶层之间物理距离以及社会分层。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精英参加体育活动有加强阶层分化以及建立社会关系的作用。比如高尔夫球场上的商业洽谈、马术俱乐部的社交活动等,既是某种文化象征又是一种资源的流动和信息交流的方式。“运动即社交”,使得体育成为一种手段而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成为一种上层阶级再生产社会资本的方法并且通过制度化固定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在国家提出“健康中国 2030”的大背景下,虽然一些精英的行为表面上看

起来是符合这个目标,但是他们的小圈子做法实际上却造成资源分配不公平。

4.2 中间阶层:程序化与场景化实践

中间阶层的运动实践表现为程序化与场景化的复合特征,既试图通过标准化运动流程实现健康目标,又需在多元生活场景中寻找运动空间,反映出其在资源约束下的适应性策略。其实践特征集中体现为对商业体育服务的高度依赖:健身房打卡成为日常仪式,许多人将每周3次的器械训练、2次的团课参与纳入日程表,形成“上班-健身-回家”的程序化生活节奏;线上课程的普及则为其提供了灵活性选择,瑜伽APP的晨间练习、直播健身课的晚间参与,使运动得以嵌入碎片化时间;亲子体育作为新兴场景,将儿童体能训练与家长运动需求相结合,如周末的亲子攀岩、少儿篮球陪练等,既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又满足自身运动需求。这种实践模式本质上是中间阶层在时间资源有限情况下的理性选择,通过将运动“任务化”提升执行效率。

时间困境是制约中间阶层运动实践的核心因素。在工作与家庭的双重挤压下,其运动时间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早晨提前半小时的晨跑、午休时间的办公室拉伸、深夜的居家健身等,均是对非工作时间的挤占。调查显示,超过60%的中间阶层健身者表示“经常因加班取消运动计划”,而“陪孩子写作业”“处理家庭事务”等则是导致运动中断的主要家庭因素。这种时间困境使得中间阶层的运动实践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系统,往往呈现“突击式训练-间歇式中断”的波动状态,与精英阶层的规律性训练形成鲜明对比。

符号消费是中间阶层运动实践的隐性逻辑。运动装备的品牌化选择成为身份彰显的微妙方式:穿着 Lululemon 瑜伽服参与团课、使用 Apple Watch 记录运动数据、背着 Salomon 背包参加城市徒步等,通过消费品的符号价值传递“有品质的健康生活”形象。这种消费行为并非单纯的功能需求,而是对自身阶层位置的确认——既区别于精英阶层的奢侈性消费,又与底层群体的实用主义形成区隔。在“体教融合”政策推动下,中间阶层对青少年运动装备的投入尤为突出,为孩子购买专业级羽毛球拍、定制化运动服等,将教育焦虑转化为符号化的体育消费,进一步强化了运动实践的场景化特征。

4.3 底层阶层:有限化与实用化实践

底层阶层的运动实践呈有限化与实用化的典型特征,其范围受限于免费公共资源,形式服务于生存需求,反映出结构性约束下的被动适应状态。其实践特征集中表现为对低成本、易获取运动形式的依赖:免费公共设施是主要场所,社区健身路径的器械使用、公园空地的集体活动构成日常运动主体,但这些设施的低使用率与高损坏率形成反差,许多跑步机因维护

不足沦为摆设,篮球场因地面破损难以正常使用;非组织化活动占据主导,广场舞的黄昏聚集、街头篮球的即兴组队、棋牌室的久坐博弈(被其视为“脑力运动”)等,均缺乏系统规划,全凭兴趣与时间偶然性发起;劳动替代性活动构成特殊形式,如快递员的骑行送货、环卫工人的街头清扫等,将体力劳动等同于运动需求满足,形成“以劳代练”的认知。这种实践模式本质上是底层群体在经济资本匮乏下的无奈选择,将运动需求压缩至最低限度。

结构性障碍从根本上限制了底层阶层的运动可能性。社区体育设施的空间短缺问题突出,许多老旧小区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足0.5平方米,新建商品房虽配套健身区,但常被开发商以“会所”名义变相收费;开放时间的冲突同样明显,公共体育馆的运营时间与底层群体的工作时间高度重叠,傍晚6点后的开放时段恰是其加班或家务繁忙期;安全顾虑进一步降低参与意愿,城中村的健身点因照明不足、人员复杂,使得女性、老年人望而却步。这些障碍并非个体选择的结果,而是城市空间分配不平等在体育领域的直接体现。

5 阶层分化下的体育资源获取路径比较

5.1 制度性资源获取的阶层梯度

制度性体育资源的分配呈现显著的阶层梯度,这种不平等通过学校体育、公共体育服务的差异化供给得以体现,并在政策执行中产生“精英捕获”的悖论现象。在学校体育领域,优质中小学与薄弱学校的资源差距尤为突出。根据《“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重点学校往往配备标准化塑胶跑道、室内体育馆等设施,体育教师中拥有专业运动背景的比例超过60%,课程设置涵盖篮球、排球等专项训练;而薄弱学校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常面临“体育教师兼任其他学科”“操场为水泥地面”等困境,课程多以自由活动为主,难以实现系统性能培养。这种差异本质上是教育资源分配阶层化在体育领域的延伸,使精英子女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占据体能素养发展的制度性优势。

公共体育服务的分配同样存在阶层分化。城市新开发社区普遍配套智能化体育场馆,如配备人脸识别系统的24小时健身房、物联网管理的室外球场等,这些设施通过“智慧体育”平台实现精准服务,主要服务于中高收入群体;而农村地区和城市老旧小区则面临设施匮乏的困境,许多村庄的体育器材仅为一套生锈的单双杠,老旧小区的健身路径常因维护缺失沦为“摆设”。这种空间分布差异与阶层居住隔离高度吻合,形成“优质资源聚集—中高阶层入住”的循环机制。

普惠性体育政策在执行中常出现“精英捕获”现象,即政策红利被中高阶层优先获取。例如,部分城市推行的“公共场馆免费开放”政策,实际使用者中超过70%为公务员、企业白领

等群体,底层群体因工作时间冲突、交通成本限制等因素难以受益;全民健身补贴发放多通过线上申请,对数字技术不熟悉的底层群体往往错失机会。这种政策执行偏差使得制度性资源在形式普惠的表象下,持续向优势阶层倾斜,加剧了体能素养培养的阶层差距。

5.2 市场化资源获取的资本门槛

市场化体育资源配置具有较高资本进入壁垒,在此背景下,商业俱乐部选择机制、体育培训领域定价制度以及数字技术鸿沟等因素加剧这种趋势,从而对中等及以下收入水平的人群造成系统性排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体育俱乐部经营模式本身就具有阶级筛选作用:一年会员费动辄数万元,而且主要分布在像北京朝阳区这样的高消费地区私人会所。这类场所一般都会对申请人进行资产审查,“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其目标客户主要是社会上层人士。相比之下,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传统健身房虽然价格便宜,但是它们在硬件设施、教练水平等方面远远不及高档场所,这也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供给局面。

体育培训行业“军备竞赛”抬高进入壁垒,在青少年体能训练方面尤为明显。像冰球、马术这类高端项目一年学费已经过万,即便是羽毛球、游泳这样的相对亲民运动,一节课私教课也要三到五百元。高昂的价格使得低收入群体无力支付。从调研结果来看,在一线城市的家庭中,年收入超过五十万元的家庭孩子有近一半人都参加了两个以上的付费体育培训项目,而年收入不到十万元的家庭孩子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孩子参加了类似培训。由于收入差异造成身体素质提高越来越成为一种“有钱人的竞争”,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孩子因为缺少资源配置而在体育能力上处于劣势。

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打破传统的资本壁垒,甚至进一步加深了“数字鸿沟”。主流健身应用的基本功能基本都需要付费才能使用,例如个性化的健身计划、营养咨询等高级的服务都是需要付费的,而且一年的费用一般都在几百元以上;而智能化的运动器材比如心率监测的手环或者动作捕捉的传感器的价格也都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高昂的花费使低收入人群难以接触到数字化体育。因为缺少教育资源造成的信息获取困难,这部分人也就无法很好地利用数字化体育资源,进而使得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更加严重。

6 社会建构的逻辑整合与再生产机制

6.1 三维度的互构关系

体能素养的阶层分化源自认知-实践-资源的动态闭环:运动认知塑造实践偏好(如底层青少年因“运动无用论”放弃体育参与),实践需求驱动资源竞争(城中村篮球场被广场舞群体挤占导致青少年退行至街头斗牛),资源可及性反向固化认知

(公共设施匮乏强化“体育属于特权阶层”的集体想象)。典型案例见于流动儿童群体:对北京皮村打工子弟学校的追踪显示,52%学生因父母“运动耽误打工”的认知形成自我否定,课余训练参与率从初一的38%降至初三的7%;该校唯一篮球架损坏后,教育局以“流动人口不确定性”为由延迟维修,资源剥夺进一步印证其“不配运动”的认知。这种互构性恶化揭示政策失效根源——当前《全民健身计划》聚焦硬件增量,却未打破认知偏见与资源错配的循环链条。

6.2 体能素养的阶层再生产机制

阶层优势通过三重隐蔽机制完成代际传递:

文化资本的具身化传承:上海网球家庭子女自幼观摩大师赛培养“运动品味”,其握拍姿势蕴含的肢体资本区别于体校生的标准化动作,这种隐性的身体符码成为精英身份标识。相较之下,农民工子女通过父母搬运重物的“弓腰惯性”内化劳动型身体观,导致单杠练习时无意识屈膝被体育教师误读为“能力缺陷”。

高校体育招生政策是一种既有制度性又有市场化的特殊形式。从表面看,它主要目的是考查学生的运动水平,但实际上,这背后却受到文化资本的影响。例如一些名牌大学在建立高水平赛艇队过程中,把“有国际水域训练经验”列为必要条件,这无疑给大部分学生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同时,一些商业机构提供的“体育留学规划服务”,用高价筑起进入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之墙。而这些都削弱了该政策所具有的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使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强,也是造成教育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符号权力对人们的认知影响是:主流媒体在报道时过于关注个人特点和社会价值的关系,比如将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取得

优异成绩的原因归结为“自律”,而忽视了她背后有一套完整的训练机制以及科学的支持系统;再比如对于低收入人群长时间坐着的行为进行解读时,一般都将其视为是由于“沉溺网络”,但是却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实际经济情况,如健身场所的价格远远高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开销等。这都是对问题的一种表面化处理,使人们不能很好地了解造成《2023年国民体质监测报告》中城乡之间柔韧性差异的根本原因。

7 结论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体质并不单纯是人的生理属性所决定,而是一种受到社会分层制约的社会化产物,在认知上,上层精英依靠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建构起独特体育观念;在行动上,他们拥有更好的体育条件并且引领行业发展潮流;而在资源方面,则利用制度以及市场手段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利益。相反的是,底层人民由于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缺少系统的体育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同时因为生活所迫也缺乏足够的动机去参与体育活动。虽然政府体育政策提倡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优良的体育资源,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打破这种社会阶层的壁垒,一些稀缺资源往往被少数人所垄断,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差距。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以下几点进行改进:一是在课程设置上加入反歧视的内容,用具体的例子让学生认识到“体质决定论”的错误观念,培养学生正确的体育观念;二是在服务上实行分层的服务方式,鼓励地方推出针对困难群体的帮助措施,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从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三是在公共资源配置上,在城市的老旧小区以及乡村较远的地方增加工作人员的数量,提高这些地方设施利用率以及服务面积;四是在评估标准上设立多维度的标准,把各个学校在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方面的表现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重点看不同的人有没有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以此来提高全社会的整体体育素质并使每个公民受益。

参考文献:

- [1] 李闯;谢禾逸.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42(6):98-107.
- [2] 张蕾.我国城市人口体育行为的整合与分化[J].四川体育科学,2023,42(2):46-49.
- [3] 杨彩如;王亚;陈曦.广州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行为调查——基于社会分层视角[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0,40(1):23-26.
- [4] 白胜超;姚辉波;郝霖霖;赵景磊.社会分层视域下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学校因素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2,41(5):49-56.
- [5] 丁品榕.为何与何为:我国弱势群体体育权利保障困境的伦理审思[J].湖北体育科技,2023,42(10):913-916.
- [6] 许玮;朱建勇.体育参与阶层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J].体育学研究,2020,34(1):77-86.
- [7] 陈卓.美国大学体育中的教育公平研究[J].山东高等教育,2020,8(6):45-51.
- [8] 沈逸凡.运动健身频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野 CGSS2015 调查数据的分析[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1,(9):77-79.